



王福春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张頔

人物志

王福春

聚焦火车上的人情百态

春运列车上对合家团聚的期盼，第一次去远方的大学报到时的憧憬，挤在一张卧铺上情侣的甜蜜……火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，也承载了世间的人情百态。3月13日，国内第一位以火车为主题进行大规模创作的摄影师王福春去世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身为铁路职工的王福春，将镜头对准了火车上的中国人，用20万张胶卷记录了绿皮火车时代。辑录成书的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成了中国摄影史上最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系列作品之一，他也因此在2014年跻身“亚洲最具影响力”的30位摄影师”之列。

王福春与火车、铁路可谓缘分不浅，他从小就住在火车站附近，对蒸汽机车和绿皮火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963年，他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，虽然此后没有成为火车司机，火车却以另外一种形式陪伴了他几十年。

毕业之后，王福春被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铁路段，负责宣传工作。有一次工会领导安排他给劳模拍照片，他便拿起一台国产海鸥牌相机拍了起来，此后彻底迷上了这门记录人间影像的技术。上世纪80年代，王福春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习摄影，拍的照片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丰富。他借着工作之便，跑遍了全国铁路线，“火车上的中国人”系列一拍就跨越了四个十年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铁路春运客流出现井喷，许多人为买春运的车票，甚至要排两天两夜的队。到了火车上，所有人都绞尽脑汁地寻找一块空地。有人霸占了车厢连接处，有人躺在座位底下，有人蹲在椅背上，还有人坐到了行李架上……只为在漫长的旅程之中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。那时“绿皮车”运行速度每小时60公里左右，夏天降温靠风扇，冬天取暖靠锅炉，长途列车的车厢里充斥着汗味、烟味、臭味，熏得人喘不过气。这样的旅途让很多人望而生畏，但人们仍然会为了买到一张火车票、成功挤上列车而感到欣喜。透过王福春的镜头，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人们“苦中作乐”的生活态度。也有人评价说“王福春拍的不是一个交通工具，而是中国人在火车这个狭小空间里的生存之道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铁路飞速发展的时代。改革开放加速了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，大规模的务工人员潮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以及对家乡故土的留恋，登上了火车，每趟车上都载着数不清、讲不完的故事。1996年，在广州-成都的列车上，王福春拍到了一对躺在硬卧上的情侣。当时的卧铺是不允许躺两个人的，小伙子看到他拿着相机，一下子用毯子把自己和对象蒙了起来，大伙儿哄堂大笑。2000年在丹麦展览的时候，有个荷兰摄影师非常喜欢这张照片，花了400美金买了下来。那也是王福春第一次知道，自己的照片竟然可以卖钱。

正如这幅照片一样，王福春的镜头不但定格下这些瞬间，还记录了交织蔓延在火车上的情绪：送别亲人时的依依不舍、归乡游子的故土思念、小孩子的嬉笑哭闹……在那个年代，来自天南海北的人，在火车这个“小社会”中迅速熟悉起来。在车厢里打麻将、带着宠物上车，王福春当年拍下的这些有趣场景，在现在的火车上大都看不到了。

进入21世纪，新型机车车辆陆续出现，列车运行时速不断攀升，客运服务越来越好。尽管运输供需矛盾依然突出，但出行环境已有很大改善。尤其是“Z”字头直达列车的出现，让曾经狼狈不堪的铁路旅行变得舒适而体面，“火车上的中国人”也多了些惬意怡然。自2008年起，中国铁路迈进高铁时代，中国人的出行方式，也随着一条条高速铁路通车而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王福春曾感慨，彻夜不眠排队买票、千军万马挤“绿皮车”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，如今的火车是陆地航班、流动宾馆，网络购票、刷脸进站、高铁订餐、自主选座、列车Wi-Fi，让坐火车俨然变成了一种享受。

同时，昔日车厢里热络唠家常的情景也渐渐消失了。绿皮火车都是对座，或者在一个卧铺的小隔间里，面对面坐着六个人，用王福春的话来说就是“有烟同抽，有酒同喝”。而现在的高铁座位都是一个朝向，人们几乎只和认识的人说话。以往坐长途火车，动辄十几二十个小时，乘客的吃喝拉撒全在车厢里，“慢了才有生活”。如今乘坐高铁，刷一刷手机就到目的地了，安静整洁的车厢里，大多数人都沉浸在电子产品的世界中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透着礼貌的疏离。也难怪王福春感慨，以前的绿皮火车就是一个缩小的社会，但是现在的高铁上“没有故事”。

在这40年里，王福春几乎“住”在了火车上，最多的一年，他坐了150趟火车。有时候在北方上车，外面还飘着雪，睡了一觉到了南方，到处春暖花开。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，他还差点为摄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在一趟从哈尔滨开往上海的列车上，王福春想走另一节车厢，却被卡在满满当当的乘客中。这时，列车突然紧急制动，他便从车上下来，试图从站台走另一节车厢，不料还没上车，火车便开动了。一般旅客或许会选择乘坐下一趟车，但王福春却没的选择——“我的摄影包还在车上，镜头胶卷都在里面”，想到这里，他本能地抓住车门栏杆的把手，身体就这样随着火车加速飘了起来。所幸，车门再次打开，列车员和几名旅客赶紧把王福春拽上了车。

这样不顾性命拍摄出的《火车上的中国人》，在2001年平遥国际摄影展上首展时，震撼了整个中国摄影界。人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：当时的绿皮火车又脏又挤，每个人都前胸贴后背，他是怎么拍出那么好的照片的？王福春形容很多珍贵瞬间是“偷来的”。为了拍到好照片，他经常要在车厢里一趟一趟地走，眼睛还要不停捕捉乘客的动作和表情。一两趟还好，四五趟的时候，别人就把他当“贼眉鼠眼”的坏人了。“贼”在王福春看来不是坏词。当摄影师就得有贼心，有贼胆，有贼眼，用正常思维和正常举动，反而拍不出好片子来。

随着人们防范意识的提高，王福春慢慢发现想拍到好照片越来越难，有时候被人发现，不仅会被骂，挨上一拳都是常有的事情。后来王福春就改用小型卡片机，拿在手里，或者放在口袋里，在火车或者地铁上随时随地就摁一张。所以他敢自信地说，谁都看见过，但谁都没拍不了，才是真正的好片子。

王福春虽然去世了，但“我给中国铁路留下了一部历史”这句自述，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为显著的印记。



王福春在绿皮火车上拍摄的照片

□郑学富

俗话说：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。自古以来，文人墨客对花草树木有着深厚的情感，不仅喜爱植树种花，还留下了许多和植树有关的诗文。

749年春，阳光明媚，惠风和畅，漂游在南京的李白漫步郊外，茂密的桑树已是葱葱郁郁，蚕儿也开始吐丝了。望着清新如画的江南春色，李白触景生情，思乡、思亲之情油然而生，写下了《寄东鲁二稚子》一诗，全诗由江南春耕时节写起，继而对自己三年前在家中楼旁栽下的桃树展开描写，由树及人，抒发对儿女的一片想念之情，怀乡土之心、思儿女之情跃然纸上，凄楚动人。全篇如同一封家书，言辞亲切，情景并茂，感人至深。

李白因在朝中受权贵排挤，怀着抑郁不平之气离开长安，开始了生平第二次漫游时期。李白携妻子许氏、女儿平阳投奔在济宁为官的亲戚。据《太平广记》载：“李白自幼好酒，于兖州习业，平居多饮。又于任城县构酒楼，日与同志荒宴，客至少有醒时。邑人皆以白重名，望其里而加敬焉。”其中提到的“酒楼”即现在的济宁太白楼。李白居济宁期间，儿子伯禽出生，夫人许氏因病去世，后又娶刘氏女为妻，生子颇黎，李白喜欢植树，他偕同夫人、女儿在太白楼旁亲手栽植桃树。之后，开始到江南漫游。

李白借居南京已接近三年，畅游在吴地春色里，更是心潮澎湃，浮想联翩，想到自己浪迹江湖，住无定居，老家的田园谁来耕种？春耕的事已来不及料理，今后的归期尚茫然无定。想起自己临行前亲手栽下的桃树如今已经是枝条高耸，花繁叶茂，一别至今已是三年，我出行在外仍未返。更是想起了娇女平阳在树下玩耍嬉戏时的情景，手折花朵倚在桃树下盼我回家，如今不见了父亲的面，眼泪会哗啦如同泉水一样流淌。

小儿伯禽已经与姐姐一样高吧，他俩并肩双行在桃树之下，没有了母亲，此时不知有谁来抚摸其背，爱怜他们。想到此，常年在外漂游、心情寂寞的李白不由得思绪万千，肝肠寸断。撕片素帛写下远别思亲的情怀，寄给远在济宁的家人：“吴地桑叶绿，吴蚕已三眠。我家寄东鲁，谁种龟阴田？春事已不及，江行复茫然。南风吹归心，飞堕酒楼前。楼东一株桃，枝叶拂青烟。此树我所种，别来向三年。桃今与楼齐，我行尚未旋。娇女字平阳，折花倚桃枝。折花不见我，泪下如流泉。小儿名伯禽，与姊亦齐肩。双行桃树下，抚背复谁怜？念此失次第，肝肠日忧煎。裂素写远意，因之汶阳川。”

760年春天，在成都城西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，唐朝著名诗人杜甫望着一座新落成的草堂，欣喜不已。尽管不是高楼大厦，但是对于颠簸流离、寄人篱下的杜甫来说，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住处。他抚今追昔，回望自己的坎坷之路，唏嘘不已。杜甫感慨万千，写下了《狂夫》一诗“万里桥西一草堂，百花潭水即沧浪。风含翠篠娟娟净，雨裏紅蕖冉冉香。厚祿故人書斷絕，恒饥稚子色淒涼。欲填沟壑唯疏放，自笑狂夫老更狂。”

此时正值春季，为美化居住环境，杜甫自己动手植树，他四处寻找树苗花草。杜甫在《诣徐卿覓果栽》一诗中描述找寻苗木的情景：“草堂少花今欲栽，不问绿李与黄梅。石笋街中却归去，果園坊里为求來”。求得苗木以后，杜甫在草堂前种花植树，饮酒赋诗，酒酣耳热后，竟与当地的庄稼汉、老农夫扳脖子搂腰，厮混在一起，“相狎蕩，无拘檢”。

其实这也流露出杜甫的本色，深入民间，体察民情。

树木栽植好后，杜甫精心管理，细心呵护，修剪、施肥、浇灌，俨然就是一位经验丰富、辛勤劳作的园丁。他在《惡樹》一诗中写下自己管理树木的感受：“独绕虛斋径，常持小斧柯。幽阴成頗杂，恶木剪还多。枸杞因吾有，鸡栖奈汝何。方知不材者，生长漫婆娑。”当然，杜甫在诗中用比喻或象征手法，表达了自己对依靠权贵、占据高位、对国家无益却生活得意小人们的愤慨之情。

819年春，一艘大船在长江边的忠州城停泊靠岸，从船上走下来一位中年人，此人就是新任忠州刺史、时年46岁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。一辆五马朱轮的专车等候在岸上，按唐朝规定，刺史可乘坐此档的“专车”。然而，忠州竟连一条能行马车的平路都没有，尽是崎岖陡峭的石磴路，白居易只能徒步而行了。

夜晚，在忠州官衙的白居易彻夜难眠，他想到了繁华的京城，曾任左拾遗的白居易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，因此频繁上书言事，甚至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。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：“白居易这小子，是朕拔擢致名位，而无礼于朕，朕实难奈。”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，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。815年，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，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，被认为是越职言事。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：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，白居易却著有“賞花”及“新井”诗，有害名教。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(今江西九江)司马。如今尽管是提拔了，但是却被派到这个荒蛮之地，白天行路难的一幕幕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，他的心情糟糕极了，当晚写下了《初到忠州贈李六》的诗，发出怒叹之声：“好在天涯李使君，江头相见日黄昏。吏人生梗都如鹿，市井疏芜只抵村。一只兰船当驿路，百层石磴上州门。更无平地堪行处，虛受朱轮五马恩。”

抱怨归抱怨，但是作为一方“父母官”的白居易仍然是尽职尽责的。他漫步忠州城时，见四周的山岗满目荒芜，目透十里，发出了“巴俗不爱花，竟春人不来”的感慨。他穿布衣，蹬草鞋，微服私访，访贫问苦，弄清了百姓不愿栽树的原因后，他苦口婆心，动员民众植树栽花，并亲自到城郊和百姓一起栽种树苗。他在《東坡种花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持钱买花树，城东坡上栽；但有购花者，不限桃李梅。百果参杂种，千枝次第开。”

为了培育管理好所栽下的树苗，他每日带领童仆，除草、中耕、施肥、培土、浇灌。树木成林后，白居易看到自己亲手栽植的树长大成林，种下的花卉争相盛开，喜上眉梢，漫步其间，写了很多寄情于树木、花草的闲适诗，如“手栽两松树，聊以当嘉宾”“白头种松桂，早晚见成林”。在他的倡导带领下，忠州昔日的穷山秃岭，后来成为青山绿水，到处郁郁葱葱、绿树成荫，百花争艳、万紫千红。

白居易在调离忠州回京城时，对忠州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感情，依依不舍，他在诗中写道：“三年留滞在江城，草树禽魚尽有情。何处殷勤重回首？東坡桃李种新成。花林好住莫憔悴，春至但知依旧春。樓上明年新太守，不妨还是爱花人。”即使到了京城为官，仍念念不忘在忠州的植树种花的岁月，他曾在诗中说：“每看阙下丹青树，不忘天边锦绣林。西掖垣中今日眼，南宾楼上去年心。花含春意无分别，物感人情有浅深。最忆東坡紅烂漫，耶桃山杏水林檎。”